

中國的種族民族主義再議

●程映虹

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中一個突出現象是種族民族主義話語的崛起，從國族敘事、世界趨勢到日常生活，反映種族意識的概念和敘事日益常見，但常常被認為是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本土傳統和文化偏見。本文以後冷戰時期種族問題的再次凸顯為背景，就國際學術界對中國種族民族主義問題之研究做一些介紹，期待引起中文學術界的重視。

一 祖先最早用火與種族優越論

有關古人如何發現用火的秘密，世界上很多國家都有自己的傳說，中國古代也有燧人氏鑽木取火的神話。但是發明用火這個全人類普遍存在的遠古經驗，在中國民族主義的歷史敘事中卻有特殊的意義。根據這個敘事，中國人的祖先不但最早知道如何使用火，而且這個發現使得中國人作為一個「種族」不同於世界上其他「人種」①。

2012年10月29日，北京《光明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關於人類起源問題的哲學思考〉②。文章列舉了五個生物進化方面的證據，說明中國人進化早於其他人種。其中一個證據就是中國人的祖先最早開始用火，使得今天中國人的胃功能和嘴的形狀不同於其他人種。因為使用火讓人類可以吃熟食，熟食容易咀嚼也容易消化，但給物種進化帶來的後果就是嘴部骨骼的退化和胃功能的降低。文章說和世界上其他人種相比，中國人的胃不適應冷、硬、生的食物或飲料，嘴部形狀平坦，這就說明中國人的祖先最早開始用火，因而胃的功能和嘴的形狀與其他人種就有差別。在這個事例中，器官功能的減弱被用來證明物種進化的徹底和更文明的飲食習慣。文章還用中國人上下肢比例小於其他人種來說明祖先最早從樹上下來、中國人臀部扁平說明祖先最早學會直立行走、中國人體味不重說明祖先最早拋棄動物用體味傳達信息的功能，等等。

文章署名「永春」，這是當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精神文明

建設指導委員會主任李長春的筆名。從2002到2012年，李長春主管中國的宣傳、文化和教育。他的任期也是中國愛國主義教育強化、民族主義思潮發展迅速的十年。這篇文章看上去似乎以非常實證、非常科學的方法來論證中華民族通過進化獲得的優越性，但傳播的卻是非常過時的、建基於十九世紀體質人類學基礎上的種族主義觀念。這個觀念符合中國歷史上的文化優越論，例如用「茹毛飲血」指游牧民族的飲食習慣，用「生番」和「熟番」區分不同程度上接受中華文化（隱喻其飲食習慣）的野蠻人，更有強迫「番人」嘔吐數日，清其腸胃，使其適應中華熟食的傳說。

在學術層面，當代中國石器時代人類學家是和研究中國人起源問題最相關的學術群體，他們不同意國際主流學術界關於現代人類起源的理論。國際主流學術界認為有數百萬年歷史的直立猿人的後裔在冰川期都滅絕了，被大約二十萬至十萬年前走出非洲的智人取代，成為今天各國人民的祖先^③。而中國古人類學家相信，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活動的直立猿人（以距今七十多萬年的北京猿人為代表）已經掌握了用火技術，這使得他們的後裔在冰川期能夠生存下來，成為此後智人的祖先。從民族主義的角度來闡釋，這就是說中國人的祖先不是走出非洲的智人，而是由本土的直立猿人演化而來，因此中國人有自己獨立的祖先。前述中國人最早使用火就是論證這個連續的進化過程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技術因素。

學術層面以外，當代中國民族主義宣傳和歷史教育也把「最早使用火」這個並未經過國際性比較論證的結論，作為「我們的祖先」在人類各

個群體中的特色和貢獻，不但以此說明一種智力和技巧的優越性，甚至在充滿民族主義色彩的國家政治儀式中展示「祖先採火」的場景和這個火種的象徵性延續，稱之為「聖火」，明白宣示中華民族之所以生生不息，源自遠古以來一種神秘的超越性力量，賦予採火和用火強烈的種族和文明優越性的含義^④。

二 為甚麼對本土種族主義缺乏認識？

具有強烈種族主義色彩的對遠古火種的神秘化和儀式化表達，不過是當今中國古人類學界種族民族主義話語的一部分，而這個話語又不過是一個更廣泛的種族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一部分。中國曾經被認為是一個不存在種族主義——或者至少種族主義並不是一個問題——的國家。但當代中國的民族主義，如果置於國際學術界有關種族觀念和種族主義的理論中來分析，就是一個由上述古人類學界參與構建的種族主義意識形態的話語體系。這個體系中有一定思想性和學術性的理論話語，但常見的是直接訴諸血統、祖先、土地和顏色（頭髮、皮膚、眼睛，等等）甚至基因這些原始性和生物性的概念，它們用種族概念定義「中華民族」，通過大眾文化廣泛傳播。在中國的學術和文化討論中，被國際學術界拋棄或者限定使用的種族概念作為一個「客觀存在」似乎是天經地義的，日常社會生活中更是如此。

上文強調「置於國際學術界有關種族觀念和種族主義的理論」，意為學術界需要正視這個意識形態及其話語表現的種族主義實質，反對用

「中國例外論」作辯護。根據「國際標準」，這個意識形態及其話語表現就是種族主義的，它既不是「文化的」，也不是「族群的」，甚至也不是「民族主義的」，儘管它和這些概念都有聯繫甚至寄生於它們之中。造成「中國例外論」的原因包括：

首先，種族主義被認為是歐美白人用來解釋世界範圍內種族權力關係的意識形態，和殖民主義、帝國主義聯繫在一起，表現形式是制度性和法律性的強制甚至暴力，很多人對它的理解就是種族性的歧視、迫害、隔離甚至滅絕，忽視了種族主義在一般意義上和民族主義的關係。實際上，種族主義首先是自我種族化，即把自己民族或者族群的文化和歷史的獨特性和優越性本質化，是民族主義的極端形式。

其次，從族群構成和歷史來看，中國不僅是一個種族似乎很「單一」的國家（不但漢人佔絕大多數，而且中國文化似乎就等於漢文化），在近代史上還是西方和日本種族主義的受害者。

再次，即使前二者都受到質疑，中國的種族主義觀念和現象又被置於「東亞」和「中國」的「本土性」之中，用文化和歷史的特殊性來解釋，其種族主義的性質就被解構或者遮蔽了。

最後，中國是一個官方意識形態支配公共話語的國家，中國官方一向拒絕把和種族有關的概念用於中國社會，其理由是中國不但是一個各族平等的社會主義國家，而且近來隨着中國的崛起，更強調中國文明本質上是和平和友善的。這一切就造成「種族主義」——以及類似的以群體歧視為研究對象的概念、定義、路徑和方法——一旦到了中國，其有效性似乎就成了問題，必須置於「中國視角」之下。有意思的是，種族主義本身是一

種偏見，而認為某個國家沒有種族主義也是一種偏見，這個雙重的偏見不但反映了對種族主義的誤解，也賦予這個國家在種族主義問題上免責的特權。

在種族主義問題上的「中國例外論」、文化相對主義或者乾脆的迴避態度，在中國社會中非常普遍。很多人面對「中國也有種族主義問題」時不是懷疑就是困惑不解，甚至一些政治觀點崇尚自由主義的知識份子也會本能地迴避或者拒絕在中國語境下使用「種族主義」這個概念。最常見的反應是：「你說的現象在中國是文化問題，與種族無關」，或者「那是民族問題，不是種族問題」。一些人認為說到歧視，中國確實有很多，例如地域歧視和省籍歧視，但就是沒有種族歧視。如果某個現象的種族歧視性質確實已經到了無法辯解的地步，他們會說：「那是因為我們不了解他們。無論如何，我們沒有種族歧視的意思。」總而言之，即使承認是種族歧視，在中國語境下也會變成一種出於無知和無辜的認知偏差，而不是通過直接和間接知識日積月累建構的偏見。可以說，要承認自己社會和文化也有種族主義這個現實，在中國遇到的常常不是對事實的認定，而是心理和認知層次的障礙。在一定程度上，階級和性別這兩個概念在中國被接受的歷史或許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這個現象：它們在開始時都被認為不存在於中國而受到排斥。

三 後冷戰時期種族問題的重現與討論

近二三十年來，以上對於種族主義的誤解或偏見受到愈來愈多的質

疑。全球化不但縮小了國際間以及國內區域間的距離，在促進人際交往的同時也突出了個人和群體的身份意識。在這個背景下，我們對種族和種族主義的認識從只注意其制度性、極端和暴力的形式，例如歧視、隔離、私刑、屠殺甚至滅絕，轉變到思想、觀念和日常生活中的表現，例如族群意識、文化傳統、民族主義情感、排外主義和一些涉及生物性差異的科學討論，外表很和諧的族群融合也從弱勢族群是否被迫接受同化的角度來被審視。此外，對於種族主義觀念的原生性的討論也不再限於西方和非西方、白人和非白人的二元對立（即認為種族主義是西方和白人特有的意識形態），而是擴展到非西方世界的文化和社會傳統。

對於種族主義之認識的這個變化，很大程度上是很多國家內部個人和族群身份政治和族群矛盾激化的結果。這些問題本來是近代殖民主義和民族國家的衍生物，但在二十世紀下半期被冷戰政治（東方與西方、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所掩蓋。對於二十世紀中期反種族主義政治的勝利，我們過去多考慮西方世界社會運動的作用，忽視了冷戰政治對於種族主義的制約，例如美國1960年代的民權運動就和美國在世界範圍內與蘇聯爭奪道義制高點有一定關係。冷戰結束後，原來被壓制的種族、族群和民族意識經歷了覺醒或者復興，台灣原住民權利運動在冷戰後期和冷戰結束後的大力發展就是一例。另外，後冷戰時期全球化所帶來的國際和國內的大量移民和遷徙，也凸顯了不同人群的身份意識和身份焦慮。所有這些，一方面使得合理合法的群體權利訴求受到關注和承認，另一方面也使得族群關係和

種族意識在很多國家以各種形式重新開始影響社會生活，其表現既有非西方國家的種族和族群暴力，也有西方國家內部愈趨惡化的種族關係。

四 國際學術界對於中國種族主義觀念的討論

（一）馮客有關種族觀念的闡釋

正是在這個背景下，1990年代以來，國際中國學界開始注意「中國特色」的種族觀念和種族主義。馮客（Frank Dikötter）1992年出版的《近代中國之種族觀念》（*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是至今為止唯一的相關專著^⑥。通過對很多古代文獻從種族主義研究角度的解讀和分析，馮客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對於社會等級、文明特性和國族（華夏與夷狄）身份的理解中包含了種族觀念的基礎，它強調祖先、家世、毛髮和膚色、血脈這些先天的因素，賦予它們本質上的優劣、善惡和美醜之別。例如中國歷史上的「崑崙奴」（深膚色外國奴隸）和一些被排斥的賤民就是此類本質化的對某個群體的社會性分類。這些本土因素在十九世紀下半期與具有理論系統性的西方科學種族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相遇，構建出一套中國式種族觀念，它將歐美白種人和東亞黃種人置於全球性種族等級的頂端，之下是其他人種，黑人在最底端。這套種族觀念通過政治和文化精英的話語、愛國主義文學、教科書和科普讀物這些文化產品，不但影響了中國人對自我和他者的認同和區分，而且用來解釋近代世界的權力體系和國族之「興亡」。馮客揭示了這套觀念在晚清是如何把國家

和種族合而為一的(例如「亡國」導致「滅種」),所以愛國主義不僅表現為保衛國土完整,也為捍衛種族生存。這些觀點不但提出了中國文化和歷史中一向被中國學界無視或者忽略的問題,而且從這個角度考察了中國近代國族建構。

基於中國案例,馮客後來又考察了一些非西方文化,提出「種族化世界」(racialization of the globe)的概念,意為把世界範圍的人群身份和權力關係從種族角度去區分和理解,也就是種族主義理論的世界性傳播。他認為系統性的種族主義理論雖然是在西方構建出來的,但強調本質差異和等級優劣的自我與他者的區別存在於很多非西方文化中,尤其是中國傳統文化。他認為「種族化世界」更大程度上遵循「交互性模式」(interactive model),意為非西方社會中類似種族觀念的文化因素和西方種族主義理論相結合,反對單一的「散布模式」(diffusion paradigm),亦即種族主義完全是西方的發明,非西方國家只是被動接受^⑥。

(二)「黃種人」與世界種族秩序

「黃種人」這個概念的接受和傳播可以說就是「交互性模式」的結果。根據奇邁可(Michael Keevak)在《成為黃種人:亞洲種族思維簡史》(*Becoming Yellow: A Short History of Racial Thinking*)一書中的研究,黃色和黃種人的概念在歐洲種族思維中有着漫長、複雜和意義含混的歷史,起初並不專指中國人,後來帶有明顯的貶義。但在十九世紀末,當西方種族主義理論給世界很多地方的人群建立起以膚色為種族符號的等級階梯時,「黃色」被中國知識份子接了過去,作為自己的種族符號放進這個分類和等級:「中國人能

夠利用這個西方術語,因為它符合現存的他們自己文明的神話。」^⑦台灣學者楊瑞松進一步分析了晚清知識份子如何利用黃色和黃種人概念,構建出一個以膚色為符號的種族象徵性話語。這個話語不再把黃色視為低劣,認為黃種人和白種人在種族能力上是平等的,但優越於其他人種。這個黃白同為優秀種族的話語甚至想像未來「黃白種戰」之可能性^⑧。無獨有偶,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日本也有大和民族與美歐白人種族決戰的文學想像。中國文化中歷史悠久的華夏中心論和華夷之辨的世界觀就是這樣在近代西方的種族主義理論中找到了「科學」的形式,而且由中外之別推廣為世界秩序。

這個中國人和西方人同樣優秀、由於近代落後屈居於白人之下但高於其他人種的中國式權力等級秩序,在潛意識中一直影響着中國人的世界性種族關係想像,是今天中國種族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基礎,其核心是一種自我中心的想像的權力體系,而不僅僅是文化和社會觀念上對某些群體的歧視。一旦中國變成物質力量的強者,這個意識形態就會浮出水面,表述於官方意識形態,也進入民間日常生活話語。新世紀以來,一些西方學者有關中國崛起的敘事中已經注意到這個現象,例如英國學者雅克(Martin Jacques)的《當中國統治世界》(*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 Birth of a New Global Order*)就用了相當篇幅在這個背景下綜述中國文化和當代中國人的種族觀念,尤其是對劣等種族的歧視^⑨。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世界性的種族權力關係中,西方與中國既是對手,又有出於同為優秀種族的惺惺

相惜，所以在雙邊關係中既有競爭和敵對，但在其他種族面前又自認是同類。後者有助於我們理解一個現象：近年來，很多中國知識份子對西方社會種族多元性可能帶來西方的衰亡痛心疾首，以至提出「白左」理論，認為一部分白人知識份子、政治家和社會活動人士支持和鼓勵文化及種族多元性，背叛了由白人自己創造和維護的西方文明，正在從內部瓦解這個文明^⑩。

(三) 種族觀念與國族建構

澳大利亞學者雷國俊 (James Leibold) 的研究聚焦於種族觀念和中國近代民族主義國家建構話語之間的關係。他認為在建構近代中華民族國家的過程中，一個關鍵問題是：如何在一個從清朝繼承下來的多族群帝國裏建立共同的身份認同。為達此目的，漢族政治和文化精英利用了歷史學、考古學和民族志學建立了以漢族的血統和祖先為中心的中華民族同源和融合論。國民革命和國民政府的領導人孫中山和蔣介石，都在共和革命以及抵抗日本侵略的關鍵時刻干預或介入有關中國歷史、考古和族群問題的討論，支持以血統為核心的種族國家觀念。在1930年代，有少數歷史學者（如以顧頡剛為代表的疑古派）主張中華民族在起源意義上的文化多元性和族群混雜性，但他們受到有國家政權背景的民族主義學者的批判和拒絕。即使是這一小部分異端知識份子，在日本大舉侵華後迫於民族主義宣傳的政治需要，也擱置了自己早先的主張，轉為強調中華民族在歷史和族群上的連續性和同一性^⑪。雷國俊也研究了當代漢種族主義 (Hanism 或 Han supremacy)，尤其是在有關

清朝歷史和滿漢關係的問題上，種族主義意識形態至少在互聯網空間激化了族群矛盾，刺激了滿漢雙方的種族情緒^⑫。

(四) 北京猿人與祖先迷思

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教授沙伯力 (Barry Sautman) 從神話學、大眾文化和人類學角度考察了1980、90年代中國民族主義如何利用祖先的概念將中國人身份認同種族化。這個被種族化的祖先概念包括神話中的龍、傳說中的黃帝和古人類學中的北京猿人，它們共同指向一個原始的、單一的、被神秘化的先祖。他指出：「隨着種族國家的理想的復興，通過宣傳中國人共享種族、血脈和文化的神話」以及「龍和黃帝的傳人的神話」，在中國各族人民中建立原始的、生物性的和文化的種族民族主義紐帶^⑬。沙伯力也開闢了一個新話題，即中國石器時代人類學界拒絕國際人類學界自1990年代開始普遍認可的結論（現代人類共享一個大約二十萬年前走出非洲的智人祖先），堅持認為中國人有自己獨立的從直立猿人發展而來的祖先。沙伯力分析了大量中國的報刊和其他資料，認為這個本來應該屬於古人類學的科學問題在中國變成了用種族觀念為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服務，也迎合了中國在國際上爭取「最早」和「第一」的政治需要^⑭。

關於北京猿人被認為是中國人的「祖先」和中國民族主義的關係，其他學者也做過研究。雷國俊考察了北京猿人被發掘和被吸納入中國民族主義話語的歷史背景，強調發現於1929年的北京猿人頭骨和活動遺址在1930年代迎合了在民族危機下強化的國族意識，作為用石器時代人類

學證明在世系和血統上存在着一個自古到今連綿不絕的「中華民族」的科學證據^⑮。台灣學者嚴曉珮在她關於同一時期(1920至40年代)北京猿人與民族主義政治的研究中得出了相近的結論，提出了「中國中心的種族民族主義」(Sinocentric Ethno-Nationalism)的概念，強調北京猿人作為民族祖先之地位的發明(invention)，是科學的普世主義和民族主義的需要之折衷結果。她也注意到1930年代的中國民族主義學者已經把北京猿人會使用火作為確定無疑的科學結論，視為在民族危機下振奮國族精神的源泉^⑯。美國學者舒喜樂(Sigrid Schmalzer)對北京猿人和中國民族主義的看法稍有不同，強調1949年以後北京猿人主要是被作為科學話語論證「勞動創造人」的歷史唯物主義原理，成為國家利用大眾普及科學進行意識形態宣傳、塑造新公民的工具。她承認在北京猿人宣傳的背後確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政治議程，甚至一定的種族觀念，也認為自1980年代以來這種傾向更為明顯。但她認為中國古人類學家也是在用充分的化石材料來捍衛他們自己的學術觀點和中國在世界學術界的地位，而西方對這些材料的忽視刺激了他們的民族主義情緒，增強了他們學術研究的民族主義動機^⑰。

筆者在2017年發表的論文〈「北京猿人還是中國人的祖先嗎？」——基因學、人類學和中國種族民族主義政治〉(“‘Is Peking Man Still Our Ancestor?’—Genetics, Anthropology, and the Politics of Racial Nationalism in China”)中對上述討論做了跟進和深入分析。由於中國在1990年代加入了國際人類基因組計劃(Human

Genome Project, HGP)，確證了在今天稱為中國的這塊土地上的智人也是大約二十萬年前從非洲走出的，所以北京猿人和元謀猿人等並不是中國人的祖先。這個結論不但引起了中國基因學家和古人類學家之間的激烈爭辯(後者認為化石和活動遺迹比基因更可靠)，而且也進入了公共討論。論文分析了中國古人類學家的論述，認為它建構了一個自古就存在的超越時空的「中國人」或者「中華民族」的歷史主體，和「中國」這塊土地建立了本質性的依附和適應關係，能對抗和消融任何外來影響。這種話語和十九至二十世紀西方的種族民族主義非常類似。中國官方在科學意義上承認並大力發展基因科學，寄望在二十一世紀能讓中國科學領先世界，但在民族主義的教育和宣傳中又從不放棄北京猿人的祖先地位。這場科學討論因而具有了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無論是主張非洲起源論還是本土起源論的人，都深知與其說他們是在爭論自百萬年到幾萬年前的古人類起源和演化，不如說是在討論今天中國人的種族身份和國族認同。從國際種族主義研究的角度，這場爭論的實質就是今天的世界，有沒有一個人類群體在進化論和生物學的意義上不同於其他群體，定義民族/國族的究竟是社會、政治、文化的因素還是種族的因素^⑱。

(五) 從校園種族主義到媒體種族主義

十九世紀末開始形成的這個「中國特色」的世界種族等級秩序把深膚色人種置於最底端，認為他們是劣等種族和生存競爭中的失敗者，這方面的種族歧視無論是歷史文獻還是現實發展都有非常充分的具體材料，是有

關中國種族主義的討論中最實證的部分。西方學界對於當代中國這個問題的研究始於對1980年代中國很多大學生與非洲留學生發生衝突而引發的學潮的分析。從1979到1989年，中國學生在上海、南京、北京和天津這些大城市裏和黑人學生發生過多起衝突，引起社會波動，中共領導人多次前往一些校園平息事態。1988年底和1989年初南京大學生反黑人學生事件是整個運動的高潮，影響波及多個城市，甚至使得南京市一度交通癱瘓，市政府不得不將黑人學生疏散到外地。學運口號中充斥粗鄙的種族主義詞彙，反映出中國學生對非洲人的敵意和歧視之深，引起了非洲聯盟國家的抗議¹⁹。

英國的《中國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在1994年刊登了一組文章，從歷史的角度分析那場學生運動²⁰。但在中文世界裏，有關1980年代中國大陸民主運動的討論從來沒有把學生校園民主運動和反黑人運動聯繫在一起。1980年代反黑人學潮和同時期一直時起時落的校園民主運動在時間和空間上平行，參與者很多是同一批人，兩個運動有時代背景和內在理路的聯繫。學界一向把1980年代學生和知識份子異議運動定義為爭取民主自由的運動(*pro-democracy movement*)。但那個運動其實也充滿民族主義色彩——「愛國」在學生和知識份子那裏是比「民主」更有力的將運動合法化的口號，其邏輯是專制政治妨害了國家的現代化和強大，而民主就是通過反對專制達到強國的目的。這個民族主義的因素特別反映在反黑人學生的校園運動中。運動發生的淺層次原因是對官方優待黑人學生、歧視本國學生和知識份子的不滿(要求

提高知識份子的物質待遇是1980年代民主運動的社會經濟原因)，深層次原因是反對國家出於政治需要，通過非民主的決策將資源用於劣等種族、損害本國現代化，因此這個運動也反映了民族主義的訴求。這個全國性的學生運動說明文化大革命剛一結束，晚清和民初產生的種族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世界觀就迅速回潮，並沒有因為毛時代的世界革命和中非友誼的宣傳而喪失影響。

隨着全球化的發展和中非全方位交往的深入，1980年代的校園反黑人種族主義已經被媒體(主要是網絡社媒)種族主義所取代，主要對象也從在華非洲留學生轉變為在華非洲勞工和商人(留學生仍然包括在內)；在非洲的中國勞工和商人受到的反華歧視也從種族主義角度進入了公共討論。筆者2011年發表的論文〈從校園種族主義到網絡種族主義——種族話語和中國民族主義〉(“From Campus Racism to Cyber Racism: Discourse of Race and Chinese Nationalism”)把1980年代和2000年代中國社會反黑人的種族主義現象置於從「愛國民主」運動到「中國崛起」的歷史演變脈絡中作了分析²¹。十年以來，從種族主義研究的角度探討在華非洲人和在非洲的華人的學術成果在國際學術界已經很多，甚至成為討論中非關係的其中一個熱點²²。此外，中國商業媒體和政治宣傳中被種族化的非洲形象也受到愈來愈多的注意，例如2018年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的《同喜同樂》節目，暗示「一帶一路」給非洲人送去文明開化和就業機會，引起了不少爭議²³。

1980年代反黑人運動所反對的官方通過非民主途徑制訂的外援政

策——尤其是對非洲國家的援助和非洲學生的優待——至今仍然是中國民間涉外民族主義情緒的常見話題。由於政治原因，相關言論只在網絡空間得到一定傳播，不可能形成社會抗議運動，但網絡空間中反映的種族主義和以前相比毫不遜色。在1980年代的學生運動中，非洲學生受物質優待和他們與中國女性的交往是矛盾的爆發點，也是當代網絡反黑人言論最常見的話題。在民族主義的男性政治視角下，有關爭議不但體現對社會資源（特別是教育經費）分配不公的憤慨，也反映了性別政治的影響：中國女性一方面被作為國家政治工具（培養親華的第三世界留學生符合國家長期對外戰略，某些大學就用給外國學生製造和中國女性親密接觸的機會〔學伴制度〕來吸引留學生^{②4}），另一方面被男性同胞視為本來應該由自己佔有的性別資源。此外，相關討論中也有對中國血統被低等種族污染、長此以往國將不國的前景恐懼，提到「亡國滅種」的高度，類似討論甚至進入了中國政治協商會議的提案^{②5}。

2007年，非裔美國人約翰遜（M. Dujon Johnson）以他在大陸和台灣生活和工作的經歷出版了《中國的種族和種族主義：中國人對非洲人和非裔美國人的種族態度》（*Race and Racism in the Chinas: Chinese Racial Attitudes toward Africans and African-Americans*）。約翰遜不是職業學者，但他的族裔身份使他對華人世界日常生活中黑人遭遇到的普遍歧視特別敏感。他也閱讀了馮客和其他人的學術研究，以此來深化理解他在華人世界的社會經歷，例如一些學校在僱用外籍英語教師時為甚麼寧願僱用俄國白人而拒絕美英黑人。約翰遜認為中國對黑人的種族

主義在海峽兩岸甚至海外華人世界都存在，所以與政治制度無關，也不是對於其他種族不了解，而是植根於華人文化的觀念。他說：「在這種中國心態（Chinese mindset）之下，要指出他們對深膚色人種有明顯的歧視純粹是浪費時間。」^{②6}他認為華人對黑人的種族歧視之所以很少被學界討論，是因為這種歧視被「亞洲文化價值」所遮蔽。一些白人學者不否認中國也存在種族偏見和歧視現象，但是他們「似乎單單把中國人挑出來給予他們一種可以展示這種歧視和偏見的特權」，成了一種「在那個文化下可以接受的種族主義」^{②7}。他懷疑白人學者覺得自己提出中國的種族主義問題會讓中國人特別覺得受冒犯（因為白人自己是「種族主義」者），影響他們在中國做研究，所以很多美國白人學者不但迴避這個問題，而且基本不接受他的觀點。

（六）大漢族主義與帝國話語

英國學者勞（Ian Law）在《紅色種族主義：共產與後共產語境中的種族主義》（*Red Racisms: Racism in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Contexts*）中考察了包括中國在內的共產黨國家（以及一些轉型後的此類國家，如俄羅斯）的種族主義問題，聚焦於國內族群政策和制度，而非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勞研究國際種族主義現象，並非中國問題專家，但這本書的價值在於把種族主義這個本來似乎只用於資本主義西方的概念系統性地引介到共產黨國家，而且把中國的現象放在世界背景下考察。勞認為中國種族主義問題的特點是以漢化（Sinicization）為目標的族群同化政策導致非漢種族的融合與消亡^{②8}。這

種制度性的同化政策包括移民、通婚、教育、就業、社會上升渠道，等等。其中受到大力提倡的通婚尤其帶有種族色彩，因為它背後的觀念是血緣決定身份。近年來，這個現象已經愈來愈受到國際輿論的關注²⁹。

台灣學者陳光興對華人社會的種族主義作了非常有洞察力的分析，把這個問題帶入了文化心理認知的層次。在他看來，中國傳統文化本身就有種族歧視觀念，中國種族主義就是漢種族主義，它在文化上表現為漢文化中心論，不但在中國本土根深蒂固，而且擴散到海外華人社會。這種持久和廣泛的種族主義觀念與中華帝國秩序下產生的對世界的認知方式有關，陳光興稱之為以中國為中心把世界「帝國化」的想像，在歷史上植根於漢人的心態和行為方式之中。這種帝國話語權力既能把非漢人的他者妖魔化、動物化，也能通過將他們從「生番」變成「熟番」把他們「人化」(humanization)，吸收進漢人佔據統治地位的種族—族群等級制度，這和近代殖民主義本質上一致³⁰。陳光興對中華帝國話語的這種分析支持了前述馮客提出的「交互性模式」，也為勞的同化政策提供了歷史的背景。他認為這種心態和世界觀在當今中國國內漢與非漢的關係和國際上中國與亞洲鄰國之間的關係中已經成為一個嚴重問題，提出中國民族主義話語必須「去帝國化」，即對過去繼承下來的觀念和立場做徹底的批判性清理。

中國當今的種族民族主義很大程度上是漢種族主義，在社交媒體有相當活力的「皇漢」(泛指以大漢族主義為核心的網絡民族主義)就是其激進右翼，其合法的公開表現是新世紀開

始後的漢服運動，即以恢復漢服為現實訴求，宣揚漢民族文化的純正和優越性³¹。澳大利亞人類學者凱大熊(Kevin Carrico)通過主要在廣州的田野調查研究漢服運動。廣州是這個運動的重要城市，也是非洲移民在中國比較集中的地方。漢服運動給外界的印象是促進漢文化的復興，因此是一場文化運動，但凱大熊揭示了它內在的種族意識。運動最積極的參與者深信漢族的種族優越性，要捍衛以黃帝為始祖的漢人的純潔，推廣漢服不過是他們喚醒和強化漢種族意識的一個具體行動。從和參與者的接觸中，凱大熊發現他們不但極端歧視黑人，為中國人的血脈將要被黑人污染而焦慮，也為「美國人將永遠不再是一個純種的白人民族」而悲歎³²。

(七) 種族觀念與中國的崛起

筆者2019年出版的《種族觀念與崛起的中國》(*Discourses of Race and Rising China*)是國際學術界對於這個問題最新的綜合性論述³³。書中分析了自1980年代以來中國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在國家政治層面如何構建、傳播和強化種族觀念，具體包括對祖先問題的討論、對流行文化的探討，尤其是對大量具有強烈種族色彩的愛國歌曲背後的港台文化資本與大陸文宣部門利用大陸文化市場的合謀的分析、對非洲和黑人的看法，等等，也分析了這個種族話語的主要群體承載者以及與階級話語的關係。概括來說，中國當代民族主義思想中的種族主義觀念由兩個部分組成：中外關係上以白種人和黃種人為優秀統治種族的世界等級秩序，以及國內以漢族為優秀統治民族的漢種族主義國家等級秩序；二者是同質同構的。它們共享

一個核心：用種族概念而非政治和文化概念定義「中華民族」和「中國人」。這一套種族主義觀念的原型產生於中國由帝國向民族國家的轉折期，是中國文化中原來就有的種族觀念與西方理論性的種族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結合，一直存在於中國民族主義的深層意識中。1949年以後中國大陸對種族主義的批判停留於反西方的政治譴責，國內族群關係中對大漢族主義的批判則止於對「黨的民族政策」的認識不足和工作方法的偏差的討論，二者都沒有追究清末民初形成的種族主義的世界秩序和與此相聯繫的種族民族主義，更沒有深入到文化和心理層次。在中國崛起的今天，這個種族主義話語系統建構了最具超越性的「中國」和「中國人」的概念，成為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中最有凝聚力和號召力的部分，甚至超越國籍身份，鼓勵海外華人的大中華情結，在這個意義上對海外華人與所在國的關係產生了不利影響。

五 中國學術界對於種族主義問題的有限討論

前文強調了由於官方意識形態和學術界以及民間的認知障礙，種族問題在中國大陸公共話語中基本是禁區。然而，隨着全球化、國際移民和國內族群關係的緊張，種族意識和種族主義概念近十年來還是逐步進入了中國公共討論，網上搜索有關「種族主義」和「種族歧視」的詞彙可以達到千萬次結果，尤其是近年來和在華非洲人有關的社交媒體的討論中。但問題是這些言論往往並不是對種族主義的分析和批判，而是對它的讚賞和辯

解，例如認為種族主義就像民族主義一樣，有好壞之分，中國人和「低等種族」通婚會使得中國人種族品質衰敗，維護本國種族的純潔等於捍衛國家主權，等等。如前所述，近年來中國的商業廣告和國家級文藝宣傳中對黑人的種族歧視性表現引起了強烈的國際反響，但官方聲明在否定這些表現的同時，仍然強調中國一向反對任何形式的種族主義³⁴。可以說，不承認中國存在觀念性和政策性的種族主義是官方政治宣傳的一條非常敏感的底線。在學術領域，中國大陸至今沒有任何一項研究，哪怕是一篇論文，探討中國社會尤其是現實中和種族有關的問題，即使不是在政治意義上而是在文化和社會心理層面上。

在這種政治、學術和社會的大環境下，在公開討論中，中國學術界對於本國的種族主義的有限批判和反思一般不以專論的形式和它們正面交鋒，而是在討論「中國的形成」和「中國人身份意識的形成」這些長時段的歷史問題時拒絕和批判一些具有明顯的種族民族主義的觀點。比較專門的論述似乎只能借助於對國際學術成果的評論來發表，馮客的《近代中國之種族觀念》多年後出版了中文版，中國主流學術界對它的反應比較謹慎，抽象地承認其視角和觀點有一定啟發性，但具體引用有限且小心翼翼。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羅新是少有的把種族觀念或者種族主義問題置於民族主義和國族身份的高度、而不是一般社會生活中的歧視來予以審視的學者。奇邁可的《成為黃種人》翻譯成中文後，羅新在書評中對當代中國泛濫的種族話語作了批判。他說有關人種的話語在今天的西方主流媒體和科學論著中基本不作為學術概念來

使用，「這不僅是出於所謂『政治正確』，其實主要是出於『知識正確』」。但是，「這些認識在中國社會還遠遠不是常識，即使在知識份子中，即使在研究歷史、民族和族群問題的學者中。事實上，我們經常聽到的是《龍的傳人》那種『黑眼睛黑頭髮黃皮膚』的種族認同。正如歌裏反覆唱着『遙遠的東方有一條江』、『遙遠的東方有一條河』，明明身在東亞的寫歌人和唱歌人，卻用『遙遠』這個詞來描述自己腳下的土地，說明他們不僅接受了西方的種族觀念，也主動以西方為中心點來測量和描述東亞」。這個觀察是非常有說服力的。羅新還有一些討論血統、基因這些被種族民族主義用來論證一個特殊的「中國人」身份的文章。總的來說，他認為「對於種族思維的反思和批判，仍然是我們常識教育中的空白點」³⁵。

此外，中國學術界對清末民初具有濃厚種族色彩的漢民族主義有所認識和批判，雖然也很有限。反清民族主義者都是漢人，在傳統的用來解釋朝代更替的「天命」觀、一定的民主共和思想和要求自強的中華民族主義之外，種族觀念也是反清革命非常有力的宣傳和動員口號。它把滿人野蠻化，把反滿宣傳種族主義化，把滿漢之間的族群文化差異誇大為血緣種族差異，認為落後甚至種族低劣的滿人要為中國面臨的「亡國滅種」危機負責，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辛亥革命後，滿族被接納入「五族共和」，成為中華民族的一員，但理論和口號上的「五族共和」並不能消除心理和實踐中的漢文化中心論和漢種族優越論的影響。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者黃興濤指出在當時的漢族政治精英中，與「五族共和」並存的是以漢

族為主的民族同化論（接近前述勞的同化政策）³⁶，但這方面的研究總體仍然匱乏。雖然清朝滅亡已經一百多年，反滿民族主義情緒仍然存在於某些漢民族主義者當中，尤其是近二十年來，漢民族主義的復興成為中國民間民族主義話語中非常突出的一翼（如皇漢主義）。在這些人中不難看到反滿民族主義甚至排滿種族主義的言論，不但渲染清朝入關後屠殺漢人的歷史，而且認為清朝的統治民族滿族要為中國近代的落後負責。

本文主要介紹國際學術界對於中國種族主義問題的一些理論分析。對於當代中國的種族民族主義本身的分析，尤其是這套話語和概念與官方和民間形形色色「中國特色」論的相互關係，需要另文展開。雖然國際學術界對於這些問題已經有一定的討論，但在中國大陸這些問題基本是禁區，海外中文學術界研究也很有限。對此，中文學術界需要充分重視。

註釋

① 本文只是在特定語境——即中國民族主義意識形態話語下使用「種族」這個概念，並不表示對這個概念的肯定。限於篇幅和論題，本文也不對種族和種族主義這些概念展開討論。

② 永春：〈關於人類起源問題的哲學思考〉，《光明日報》，2012年10月29日，第3版。

③ Brian Handwerk, "An Evolutionary Timeline of Homo Sapiens", *Smithsonian Magazine*, 2 February 2021, www.smithsonianmag.com/science-nature/essential-timeline-understanding-evolution-homo-sapiens-180976807/.

④ 〈江澤民主席點燃中華世紀聖火〉(2020年1月1日)，新浪網，

<http://news.sina.com.cn/2k/china/2000-1-1/47767.html>。

⑤ Frank Dikötter, *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2); rev. and exp. 2d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中文版參見馮客(Frank Dikötter)著·楊立華譯：《近代中國之種族觀念》(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

⑥ Frank Dikötter, "The Racialization of the Globe: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in *Racism in the Modern Worl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Cultural Transfer and Adaptation*, ed. Manfred Berg and Simon Wendt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12), 20-40.

⑦ Michael Keevak, *Becoming Yellow: A Short History of Racial Thinkin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130.

⑧ 楊瑞松：《病夫、黃禍與睡獅：「西方」視野中的中國形象與近代中國國族論述想像》(台北：政大出版社·2010)，頁84-91。

⑨ Martin Jacques,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 Birth of a New Global Order* (New York: Penguin, 2009), 244-55.

⑩ 參見程映虹發表於《東方歷史評論》的文章〈「白左」與「漢奸」：民族國家內部的他者〉，引自搜狐網，www.sohu.com/a/276621886_120776。

⑪ James Leibold, "Competing Narratives of Racial Unity in Republican China: From the Yellow Emperor to Peking Man", *Modern China* 32, no. 2 (2006): 32.

⑫ James Leibold, "More than a Category: Han Supremacism on the Chinese Internet",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203 (September 2010): 539-59.

⑬ Berry Sautman, "Myths of Descent, Racial Nationalism and Ethnic Minoriti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acial Identities in China and Japan, ed. Frank Dikötter (London: Hurst, 1997), 83.

⑭ Barry Sautman, "Peking Man and the Politics of Paleoanthropological Nationalism in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0, no. 1 (2001): 95-124.

⑮ James Leibold, "Competing Narratives of Racial Unity in Republican China", 181-220; "Filling in the Nation: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Trajectory of Pre-historical Archaeolog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in *Transforming History: The Making of a Modern Academic Discipline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ed. Brian Moloughney and Peter Zarrow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11), 333-71.

⑯ Hsiao-pei Yen, "Evolutionary Asiacentrism, Peking Ma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centric Ethno-Nationalism",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iology* 47, no. 4 (2014): 585-625. 嚴曉珮的博士論文也是關於北京猿人和中國民族主義國族建構之間的關係，參見"Constructing the Chinese: Paleoanthropology and Anthropology in the Chinese Frontier, 1920-1950" (Harvard University, 2012)。

⑰ Sigrid Schmalzer, *The People's Peking Man: Popular Science and Human Identit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270.

⑱ Yinghong Cheng, "Is Peking Man Still Our Ancestor?" — Genetics, Anthropology, and the Politics of Racial Nationalism in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76, no. 3 (2017): 575-602. 但是這篇論文沒有介紹和分析同一批中國科學家利用基因科學論證「中國人基因」，構建了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中新的種族話語。這個問題需另文展開討論。

⑲ 早在1960年代初，中國政府全額資助的第一批非洲留學生(大約二百人)因為遭受種族歧視和不滿

中方的政治灌輸，絕大多數在兩年不到的時間就中斷學業返回非洲。

⑳ 參見 Frank Dikötter, "Racial Identities in China: Context and Meaning"; Berry Sautman, "Anti-black Racism in Post-Mao China"; Michael J. Sullivan, "The 1988-89 Nanjing Anti-African Protests: Racial Nationalism or National Racism?",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138 (June 1994), 404-12, 413-37, 438-57。另外，Richard Lufano, "The 1988 Nanjing Incident: Notes on Race and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26, no. 1-2 (1994): 83-92 也提供了類似的分析。

㉑ Yinghong Cheng, "From Campus Racism to Cyber Racism: Discourse of Race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207 (September 2011), 561-79。

㉒ 比較新近的例子，參見 Roberto Castillo, "'Race' and 'Racism' in Contemporary Africa-China Relations Research: Approaches, Controversies and Reflections", *Inner Asia Cultural Studies* 21, no. 3 (2020): 310-36。

㉓ Chenchen Zhang, "Racism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 CCTV's Spring Festival Gala: What a Controversial Skit Tells Us about Racial and Geopolitical Narratives in China" (23 February 2018), <https://thediplomat.com/2018/02/racism-and-the-belt-and-road-in-cctvs-spring-festival-gala/>。

㉔ 參見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山東大學學伴制度爭議>。

㉕ 潘慶林：〈從嚴從速全力以赴解決廣東省非洲黑人群居的問題〉(2017年6月27日)，崑崙策網，www.kunlunce.com/gcjy/zhilijianyan/2017-06-27/117058.html。

㉖㉗ M. Dujon Johnson, *Race and Racism in the Chinas: Chinese Racial Attitudes toward Africans and African-Americans* (Bloomington, IN: AuthorHouse, 2007), 45; 56。

㉘ 勞提出種族主義制度和政策的四種類型：滅絕(exterminationist)、隔離(segregationist)、排斥(exclusionist)和同化(assimilationist)。參見 Ian Law, *Red Racisms: Racism in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Context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㉙ Keith Zhai, "China's Communist Party Formally Embraces Assimilationist Approach to Ethnic Minoritie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8 October 2021, www.wsj.com/articles/chinas-communist-party-formally-embraces-assimilationist-approach-to-ethnic-minorities-11633702544。

㉚ Kuan-Hsing Chen, *Asia as Method: Toward Deimperializa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 260-64。

㉛ 張跣：〈「漢服運動」：互聯網時代的種族性民族主義〉，《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學報》，2009年第4期，頁65-71。

㉜ Kevin Carrico, *The Great Han: Race, Nationalism, and Tradition in China Today* (Oakland,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7), 66-67。

㉝ Yinghong Cheng, *Discourses of Race and Rising Chin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㉞ 〈春晚小品涉種族歧視？中方：挑撥中非關係是徒勞的〉(2018年2月22日)，中國新聞網，www.china-news.com/gn/2018/02-22/8452195.shtml。

㉟ 羅新：〈世上本無黃種人——讀奇邁可《成為黃種人》〉(2019年6月26日)，澎湃新聞網，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591190。

㊱ 黃興濤：《重塑中華：近代中國「中華民族」觀念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頁144-45。